

希伯来语的复兴:误读与成因考辨^{*}

陈 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希伯来语复兴现象因其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被视为社会语言学上的“奇迹”。这种认知产生了三种亟待澄清的误读:认为希伯来语复兴是一种古代“死”语言的重生;在其过程中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本·耶胡达的巨大贡献;贯穿其始终的是国家语言政策层面的支持。本文在深入分析这三种误读的前提下,彰显出希伯来语复兴成因的两个重要维度:一是神圣的维度,即犹太教传统所保留的语言遗产;另一个是世俗的维度,即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集体农场进行的语言实践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两种维度作为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动力,贯穿其过程始终,展现出犹太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建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希伯来语作为母语的复兴被视为人类语言史,特别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受到研究者广泛的关注。直至今日,希伯来语复兴的特殊性和不可重复性还经常被称为语言学上的“奇迹”。伴随对希伯来语复兴原因的诸多阐发,产生了一些亟待澄清的误读。如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希伯来语复兴是一种古代“死”语言的重生,在其过程中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是本·耶胡达的巨大贡献,贯穿其始终的是国家语言政策层面的支持。

首先,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希伯来语复兴并非是一种语言的复活,且这种复兴的场域主要涉及日常生活的口语体。希伯来语原为迦南当地人

^{*}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非实体研究机构支持计划项目“以色列语言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7XTS25)阶段性成果。

^{**} 陈影,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的语言,亚伯拉罕举家定居迦南后,逐渐使用这一外邦语言。犹太人在征服迦南之后,即公元前13世纪左右,希伯来语成为犹太人广泛使用的语言。135年,罗马人打败重获国家主权的巴尔·科赫巴起义者之后,绝大多数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被杀害,这标志着希伯来口语体的终结。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希伯来语在犹太人中间仅仅应用于犹太教文献和宗教仪轨中,它偶尔也会成为流散犹太人的通用语,但已经丧失了母语的地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犹太人往往把希伯来语与当地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母语,如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等。现代希伯来语并非从一种“死语言”中重新获得生命,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圣经希伯来语一直是犹太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希望成为拉比的犹太男子把学习圣经希伯来语视为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部分;犹太重要节期的宗教仪式通常也是通过希伯来语进行的。总之,希伯来语从未离开过犹太人的生活,它在犹太人阅读、书写、祈祷、研究层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中世纪欧洲的犹太人,只能使用希伯来语,而非其他的欧洲语言进行读写。在19世纪,四分之三的犹太人能够读懂圣经希伯来语。换言之,尽管没有人把圣经希伯来语作为日常交流的母语,但它在犹太人的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希伯来语并不存在重生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希伯来语在某种意义上的复兴。

具体而言,希伯来语的复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希伯来语书面文学的复兴,二是希伯来语口语的复兴。前者主要发生在欧洲大城市的一些犹太文学家中间,其载体是18~19世纪犹太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后者则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移民中。前者为后者的实现提供了大量的语言素材,这主要体现在18世纪中期希伯来语作品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量出版,这种新的文化运动表现出犹太人的世俗化诉求。而两者的结合发生在1924年,以犹太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Haim Nahman Bialik)移民巴勒斯坦为标志,此后希伯来口语体与希伯来语文学逐渐交融。本文所言的希伯来语复兴即是指狭义上的希伯来语口语体的复兴。

第二个误区或误读是片面夸大艾利泽尔·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在希伯来语复兴中所起的作用。学术界一般认为,本·耶胡达的作品和个人实践对希伯来语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2000年来第一位把希伯来语作为母语的人,他还亲自编纂希伯来语字典,着力解决现代社会中古典语言复兴后词汇量大量匮乏的问题。但很明显,希伯来语的复兴并不是围绕本·耶胡达展开的。虽然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初阶段,本·耶胡达便在耶路撒冷定居,开展复兴希伯来语的工作,但希伯来语复兴的决定性步骤主要发生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而非类似耶路撒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极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端正统势力过于集中,耶路撒冷事实上是最后一个大规模使用希伯来语的地方。本·耶胡达编纂的字典也是在希伯来语复兴初具规模后才出版的,由于本·耶胡达自身专业的局限,该字典的质量亦备受争议,其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目前,以色列学术界普遍认为希伯来语复兴作为一个巨大的语言工程,是无法单凭某一个人的努力得以实现的,且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以色列集体农场的希伯来语普及教育与本·耶胡达有直接关联。1914年,本·耶胡达居住的耶路撒冷只有4%的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而当时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已经影响到巴勒斯坦大部分的犹太社区。本·耶胡达创建的希伯来语委员会(HLC)在1891~1904年,即希伯来语复兴的主要时期并未开展太多活动。尽管如此,我们对本·耶胡达的评价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对希伯来语的现代复兴具有开创性的作用,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力地驳斥了当时认为“希伯来语根本无法回到人们生活中”的观点,将一件在大多数人眼中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他的字典也向世人证明希伯来语具有世界上其他任何语言的特质。此外,本·耶胡达还撰写文章,阐述复兴希伯来语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正如他在《一个重要的问题》(A Weighty Question)一文中指出的,复兴希伯来语不仅关涉到希伯来语的未来,也关系到犹太人的未来。如果衡量一个民族的标准是统一的语言,那么对犹太人而言,这种语言便是希伯来语。对任何研究希伯来语复兴和以色列语言政策的人来说,本·耶胡达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人物。

第三,希伯来语复兴并非源自上层的宏观语言规划。土耳其和后来托管时期的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语言景况大致持一种漠视和放任的态度。在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由于英国基督教的宗教背景,特别是希伯来语是《圣经·旧约》的主要语言,所以英国基督徒对希伯来语复兴运动的放任实则是一种支持。早在英国托管之前,英国政府就鼓励把希伯来语作为犹太人的民族语言,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托管后,英国政府将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规定为三大官方语言,这极大地提升了希伯来语的地位,为后来希伯来语在犹太人社团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为了避免在托管区过大的财政投入,英国下放不同种族社区的教育决定权和管理权,使希伯来语教育在不同层次的学校中展开,这为希伯来语在犹太社区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有意思的是,犹太人自己的准政府性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创建初期对希伯来语复兴也是淡然处之。犹太团体内部虽然成立了若干与希伯来语复兴有关的组织,但这些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分歧使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各方都认可的权威语言裁决组织,前文提到的希伯来语委员会(HLC)因其成员资质和与实践脱离等问题,其地位一直备受争议,加上缺乏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支持和引导,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在起步时期就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引导,或者说,处于一种混乱的民主状态。一



个典型的例子便是 1903 年成立的以色列教师工会。以色列教师工会是希伯来语复兴的中坚力量,其成员大多为希伯来语教学一线的教师。教师工会的创建源于在希伯来语教学中,由于词汇的缺乏,授课教师根据自己的标准臆造词汇,导致不同地区,甚至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班级,各自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同样的含义,这与希伯来语复兴的初衷大相径庭。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犹太人被称为“dor ha-pelagah”,意为“被分割的一代”,因为他们交谈所使用的希伯来语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呈现为诸多变体。为了应对这一景况而成立的教师工会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与希伯来语委员会沟通、协调,共同制定一套统一且科学的现代希伯来语词汇,将希伯来语转化为生活的所有领域(如家庭、学校、贸易、艺术、科学等)皆可使用的口语语言,使希伯来语具有表达人类思维所有层面诉求的可能性。但两个组织之间的分歧往往多于共识。教师工会认为,希伯来语委员会立足耶路撒冷,与希伯来语复兴的主要场域——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农场(主要位于雅法、加利利、耶斯列山谷)相去甚远,委员会成员脱离语言教学实践,制定的词汇和规则不适合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且其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并不具有相关的学术背景。

如上文所述,犹太人当时的准政府组织——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对这一时期的希伯来语复兴运动持漠视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关注在政治上重建犹太人的国家,他们深受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响,对犹太传统的了解和继承非常有限。以“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为例,他就承认自己在犹太会堂中所说的希伯来语让他深感不安。在赫茨尔看来,犹太人没有必要复兴希伯来语,因为未来犹太人国家的主要语言应该是人们不受任何约束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任何统一的语言都会产生语言的隔都,阻碍犹太人走向世界。总之,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语言并非是塑型犹太人国家的决定因素。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对希伯来语的复兴没有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它所传播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在很大范围内获得犹太人的接收和认可,这为后期希伯来语的复兴播种了思想的种子。

二

在考证对希伯来语复兴产生的三种误读的基础上,希伯来语复兴的成因便成了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语言的复兴主要体现为一种死语言(即该语言已无母语者)重新成为某一社团正常的交流方式。希伯来语复兴背后的原因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斯万(Sivan)罗列了希伯来语复兴的五种原因:犹太人回归巴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巴勒斯坦故土；希伯来语建基在强大的圣经传统之中；本·耶胡达的开创性工作；希伯来语语言自身的包容性；犹太社团中崭新的、不同的词汇需求。哈夏夫(Harshav)提出了三种历史原因作为希伯来语复兴的条件,即:希伯来语在当时仍具生命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希伯来语作为文学、翻译、科学等诸多领域的书面语言;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创建的“崭新社会细胞”。对希伯来语复兴原因的研究层出不穷,研究视角多样,结论亦不尽相同,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维度是大部分研究都无法规避的:一个是神圣的维度,即犹太教传统所保留的语言遗产;另一个是世俗的维度,即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集体农场进行的语言实践与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两种维度作为希伯来语复兴的原动力,贯穿其过程始终,彰显出犹太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建构。

希伯来语的复兴首先得益于犹太教传统对希伯来语语言遗产的保留。传统上对犹太人身份的界定,除血缘脉络的沿袭外,最重要的便是宗教传统的继承。换言之,传统犹太人的信仰与其血缘一样是给定的,成为犹太人与信仰犹太教是一体两面的。两千多年来,希伯来语一直是犹太人传承宗教律法、研习宗教思想、践行宗教仪轨的唯一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传统的语言载体,希伯来语从未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完全脱节。此外,犹太人所看重的教育,其核心便是犹太教经典的学习,如托拉律法、塔木德、密西拿等,这些宗教经典除个别章节使用阿拉姆语外,大部分都是用圣经希伯来语写成的。经过犹太传统教育的犹太男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希伯来语的书面体。

尽管有一些研究者对现代希伯来语与圣经希伯来语之间的亲缘性有所保留,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希伯来语与圣经希伯来语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小于现代英语与中古英语的不同。现代希伯来语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圣经希伯来语中的闪语特质,如字母、书写顺序、介词前缀、物主后缀、三种词类(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的阴阳性、动词变位等。当神圣的圣经希伯来语“降格”为世俗语言的时候,其中抹去的只是超验性的指向,犹太人几千年来共通的关于生存的表达方式得到了维系。如希伯来语中“knesset”(议会)一词,在圣经希伯来语中的含义为“最高犹太会堂”,即第二圣殿时期由120名长老、智者和先知组成的享受崇高声望的宗教组织。在犹太教传统为希伯来语复兴留下了宝贵的语言遗产的同时,世俗化的宗教维度在现代希伯来语中得以传承,影响并塑型了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当一个具有宗教色彩、源自圣经的词汇从它神圣的语境中脱离,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时,这不但是希伯来语复兴的世俗表征,同时也是宗教传统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新生。此外,受到现代犹太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多犹太人在学习圣经希伯来语的过程中,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与《圣经》中的应许之地连接在一起。在宗教的语境中,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倾向在希伯来语中萌生,这在第二次阿利亚



(即移居以色列浪潮)中格外明显。犹太人的传统孕育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对圣地的向往镌刻在圣经希伯来语之中。

希伯来语复兴的实践与以色列的几次主要移民浪潮密不可分,特别是以色列建国前的几次阿利亚中创建的集体农场。在语言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真正促成希伯来语复兴的更多地取决于当时新建成的这些农业垦殖地和集体农场。在这些地方,希伯来语被作为民族语言传授给移居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裔,使这些犹太移民开始了母语转换的过程。哈希尔(Hahir)将希伯来语的复兴称为“伟大的跳跃”,其过程分为四个步骤:第一,犹太社区的孩子被“灌输”一种必要的语言态度;第二,学校对他们展示出语言使用的范本;第三,他们不但在学校把希伯来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而且在学校以外的场所,同样使用希伯来语;第四,这些孩子长大后,用希伯来语同自己的下一代交流,他们的下一代就成为以希伯来语为母语的一代犹太人。在这些倡导集体力量的“准共产主义”农场中,这些犹太移民势必要从自己的母语——意第绪语、俄语或波兰语,转变为希伯来语进行交流;他们的下一代即“基布兹的一代”通常是在集体中成长起来,每天只有晚上有限的时间与父母接触,他们往往将希伯来语作为唯一语言。此外,第二次阿利亚浪潮中,从东欧来的一批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后,发起了青年工人运动(ha-poel ha-tzair),他们的口号“希伯来土地、希伯来工作和希伯来语言”中就有对希伯来语的诉求。这个口号在本质上是 19 世纪末犹太复国运动意识形态的延续,那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聚焦流散状态下犹太人生活中虚假的部分,犹太人要想重获自己的民族身份,就需要其他民族所具有的东西——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语言。

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语境里,这些母语不同的犹太移民内部自发产生了一种复兴希伯来语的诉求和社群压力。以 1909 年创建的特拉维夫为例,在城市创建早期,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在大街上放置“犹太人——说希伯来语!”(Yehudi—Daber Ivrit!)的标志,在公共场合说其他语言的犹太人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回应,还会受到同胞的鄙视。希伯来语的复兴不仅仅是一个推广使用的过程,它更多地成为一种保护行动。1916~1918 年进行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人口调查”中,有 40%的犹太人将希伯来语视为第一语言或唯一语言。1948 年,以色列建国半年后进行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犹太人把希伯来语作为自己唯一的语言,5%的犹太人将希伯来语作为第一语言,5%将希伯来语用作第二或第三语言。30 年来,说希伯来语的人口仅仅增长了 20%,这并非说明希伯来语复兴力量的减弱,相反,其原因是大量国外犹太移民的涌入,他们的到来,特别是他们在以色列出生的后代是希伯来语复兴在 20 世纪后半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重要基础。

作为以色列建国的主导思潮,犹太复国主义虽然彰显出显性的世俗主义特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征,但它从最初形成之时就受到宗教与世俗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并对希伯来语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在历史的语境里,还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语言使用作为个体独立的象征与民族意识的自我肯定,势必表征出某种意识形态性,因为运用哪种语言往往标志了言说者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倾向,对希伯来语复兴而言亦是如此。因此,希伯来语复兴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哈德·哈姆(Ahad Ha'am)甚至认为希伯来语的复兴并非是希伯来语口语体的复兴,而是希伯来文化的复兴。希伯来语复兴带来了犹太民族认同标记的明确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而言,希伯来语是其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建构元素。在塑造欧洲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语言的标准化一直贯穿其中,在国家范围内,某种地方性语言被选作这个国家的语言,并通过国家的教育体系对之加以强化、丰富和传播。但如前文所述,语言问题并没有被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重视,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从来就不是某种统一的教义,而是犹太人内部不同派别、思想倾向、政治派别较量的场所。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希伯来语复兴产生直接影响的事件当属1904年开始的第二次阿利亚。这些躲避基什尼奥夫屠杀的犹太人踏上巴勒斯坦之后,迫切希望与自己流散时期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区隔,因此,他们在1913~1914年开展了一系列的语言战争,其主导思想便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下,阻止任何欧洲语言(主要指德语)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的使用和传播,将希伯来语作为未来犹太人国家每个人应该使用的语言。因为流散于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在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园时,势必不能选取某一个族群居住的欧洲国家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这不但有是否能达成一致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有犹太民族情感的因素。人们在一个统一的犹太国家里,理应使用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这种语言不应该是犹太人流散中使用的任何一种屈辱的、压迫者使用的语言,希伯来语这一犹太民族大流散前使用的语言因此成为最佳的选择。在这一语境下,希伯来语的复兴和使用早已摆脱了语言学的范围,成为犹太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表达方式。希伯来语的标准化与口语化因此也成为约束未来犹太国家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先期主导力量。正如现代希伯来语诗人比亚利克所认为的,如果赫尔德把语言作为一个国家的灵魂,那么希伯来语的缺席就意味着对未来犹太国家灵魂的背叛,选择被流放地的语言所同化,就是对希伯来语的背叛,就是对锡安山的背叛。

这些具有犹太复国主义情结的移民拓荒者进行复兴希伯来语的实践,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初期,把希伯来语作为日常语言,其自身还不完善。很多提倡使用意第绪语的犹太人甚至认为希伯来语是一种瘫痪的语言,它在犹太人大流放



开始至今的 2000 多年里,处于一种哑然的状态。因此,本·古里安认为,犹太人必须要从“令人哑然的灾难”中被救赎出来。此外,这些在第二次阿利亚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多数已经错过了语言学习的最佳时间,而当时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把希伯来语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表达语言,这对很多犹太人而言便产生了一种文化身份的断裂与重构。举例来说,第二次阿利亚的重要代表人物奈他·哈帕兹(Neta Harpaz)精通意第绪语,深谙意第绪文学,他可以用意第绪语美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抛弃意第绪语,重新学习、使用希伯来语对他而言意味着“最终会导致思想上的无声”,这无异于“用自己的双手窒息力量的源泉”,使他无法“面对犹太复国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挑战”。哈帕兹认为,这就像离开了自己的灵魂与精神的根基一般。但随着他对犹太人定居点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他逐渐发现并理解了希伯来语复兴所蕴含的革命意义。希伯来语的复兴更多地体现出犹太人民族意识的复兴,这是一种以色列人文化认同的重新建构,未来犹太国家的建立,在各个层面都无法脱离希伯来语的使用。最后,哈帕兹意识到“正如在身体上扎根圣地需要我们斩断流散的根基一样,精神上扎根于此同样需要斩断流散的环境。此外,我如今认识到,这并不是是一场反对意第绪语的战斗,而是一场支持希伯来语的战斗,因为这种语言需要复兴与重生,(它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根本性的革命”。

三

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前往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经常被冠以反叛者的标记,因为他们对犹太传统中的律法和准则进行强烈的批判,宗教的遗产在他们看来是与现代性社会格格不入的落后意识形态,他们祖先与父辈的生活、宗教、信仰模式对他们而言也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正如前文所述,犹太教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了犹太人民族认同的核心,他们希望返回圣地,重建犹太人的家园,无论其中的主导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世俗色彩,但这种做法的根源就是犹太人的宗教情结,或者说锡安情结。在圣地重新塑型的犹太文化需要继承并建基在祖先的精神遗产上,这在希伯来语复兴运动中有着明确的体现。换一个角度来说,希伯来语的复兴彰显出犹太人在语言层面理解世俗社会的诉求与愿望,它将犹太教的神圣记忆投射到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形成了一种犹太人的文化自治。

希伯来语复兴的语言基础源于传统,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发扬。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这体现在现代希伯来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希伯来语的延续与革新,它继承了犹太教传统保留的语言遗产。与此同时,希伯来语复兴的实践与犹太定居者的生活方式、教授希伯来语的策略,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现代希伯来语的广泛传播和使用,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复兴,世俗的犹太国家拥有了坚实的立国之本。希伯来语的复兴建构了一种价值体系,这种体系重塑了流散时期犹太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向心力。正如海勒·哈金(Hillel Halkin)所言,任何希伯来语的替代品都意味着将会丧失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内容,其政治上的后果便是将这场运动降格为只是一场殖民活动,这正是它的敌人长久以来的观点,它最后也将提前终结它的命运。